

编者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这一源于西方的学术话语在中国被广泛关注并激起热烈探讨,这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关,另一方面,也源自现代性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在中国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论争背后,隐含着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取向,但试图有效地解释当下中国却是共同的诉求。为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研究,在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出版之际,近期刊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就现代性的一与多、普遍与特殊以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等展开研讨。这里刊出一组与会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 (专题讨论)

内容提要 高瑞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宛若一部现代传奇,“多元现代性”概念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必要前提,“中国的现代性”概念的展开蕴含着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理解,而其最直接的要求是对“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的理解。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必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郁振华从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新著《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出发,探讨了现代性的认知维度,认为立足于三种合理性(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论辩合理性)的概念框架,希尔贝克对现代性之一和多、普遍和特殊获得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看法,这一框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提供新的视角。丁耘指出,现代文明可以被理解为是两层的,现代文明之一元的普遍性存在于物质生产这个底层,而现代文明之多元的特殊性则存在于符号与交往关系再生产这个上层。而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符号/影像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越发步调一致,现代文明的单一与普遍会越来越压倒其多元与特殊。

关键词 多元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性 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6-0005-11

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传奇

高瑞泉

与实践向度的现代化运动相应,现代性研究曾经对中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深浅不一,而且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实践取向也有深刻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共思想史而言,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的现代性”得以确立为一种共识。这一概念是长期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结果,可以被视为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的一种理论表达。当然,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根本上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绩效之上。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前,现代化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实验性,即在“富强”的目标下,用中国可能具有的方式来学习西方经验、赶超西方。用“中国的现代性”来解释“中国传奇”的认识论路径,可以说是“摸着中国的石头,过现代化的河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崛起了。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同时都期待在现代性研究中获得相应的理论肯定。与此同时,现代性的“一与多”始终萦绕在理论家脑际,“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的概念已经在学理上被多方讨论。诸多论述都

意在说明,现代性不再是单一的现代性,更不是西方模式的复制,而且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西方模式”或者单一的“欧洲模式”。由此,“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即现代性是复数的,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必要前提。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获得一种实践上的证成。从艾森斯塔德到查尔斯·泰勒,都提升了我们在“多元现代性”的预设下研究“中国的现代性”的自觉。而奎纳尔·希尔贝克教授(Gunnar Skirbekk)的新著《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①,则通过描述挪威的现代化史来展开他对现代性的哲学分析。它出于作者对北欧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的反思,结果达成了多元现代性视域下挪威现代化史的概念化。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会有诸多启发,包括关于如何在“多元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互相证成的方向上思考合理性的诸形式,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与“挪威的现代性”,无论是它们形成的过程,还是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都是如此不同,正如挪威现代性仿佛是一则北欧童话(Tale)^②,而“中国的现代性”注定是一场跌宕起伏的传奇(Legend)。这种强烈的对比,有助于更好地展示“中国的现代性”的特点。

二

说中国的现代性宛如一部现代传奇,首先是由于中国在现代世界史上出演的角色有强烈的戏剧性。以20世纪的一百年为例:从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面临进一步被瓜分的危险,到2001年高调进入WTO,并且在而后的金融危机中被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随着中国的GDP直逼美国,“中国崛起”“中国奇迹”成为描述中国现代化的经典标题。在此语境下,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概念的首要意义,变成了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

以“多元现代性”为前提,当代中国最粗放的外部观察者会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三者的耦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不过这种观察结论一定会遭受许多质疑(包括后面我们会提及的,儒家文化据说是已经断裂的传统)。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描述性的概念,相对于西方现代性而言是“中国”的,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是“现代”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毋宁说又回转:什么是传统(中国),什么是现代?因此,除了在合理性的诸形式的意义上理解现代性以外,我们似乎应该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化层面上来回答问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是从“学习型的现代性”开始,转变为“反省型的现代性”。^③西方现代性是内生的现代性,是其社会自然演变的产物,其间受到过外部的影响,也主要不是以强制力或暴力的形式出现。而中国一开始就是以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为目标,具体地说,是以“富强”为目标导引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首要的追求是“富强”和能够导致富强的科学技术,换言之,是工具合理性一开始就处于优先的地位。它相应地引起建制上的改变,包括学术学科和社会制度上的变革,后者连同“富强”的追求一起都需要意义世界的辩护,由此导致广泛而深刻的“重新评定一切价值”。价值重估固然促进了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论辩合理性,同时也进一步压制了传统价值的空间,瓦解了意义世界的传统秩序。

毋庸讳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持续紧张,在现代中国成为一个相当凸显的现象,不但表现为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分裂(如王国维“可信”与“可爱”的分裂),表现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裂(如“科玄论战”所展示的那样),而且表现为传统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对立,表现为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

① [挪威]奎纳尔·希尔贝克:《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刘进、王寅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② 这本著作关注的首先不是20世纪中叶和战后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它的优越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希尔贝克专注于19世纪挪威的现代化历史:民众运动(自下而上)与精英(自上而下)互相配合,和平地、“以让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相融合的方式,促进了基本的现代化过程”。(见上书,第56页)作者把传统与变革之间平稳对接,称作“田园式的启蒙”,令人想起鲁迅当初说斯堪的纳维亚是“安静而进步的国家”,而20世纪中国社会的进步通常都显得如此曲折,并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③ 高瑞泉:《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主义对于工具合理性的批判，以及以此为先导的某种“复魅”诉求。它们最后集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现代价值重建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而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都不能确保牢固地占据“社会重心”的地位，更难以达成以高度信任为基础的普遍团结。

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历史性大转变的角度说，虽然可以依照合理性（rationality）的诸形式来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但它的实现不会是纯粹理想的力量所推动，相反总是会伴随着怀特海所谓的“强制力”甚至“暴力”的作用。^① 像诸多不幸而有被殖民的痛苦经验的国家一样，西方现代性在中国人面前呈现的，是“无情感的力量”与“理想的力量”兼而有之，被怀特海视为“理想的力量”或“说服的力量”的基督教和民主，也是挟着“强制力”乃至“暴力”进入中国。中国的现代化的前一百年，几乎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

现代化需要相应的社会动员，以获得其动力。最初的动力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结果中国的现代化最初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由于国家幅员辽阔、多民族且人口众多、主要是内陆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以及最初需要从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下获得解放等条件，在自上而下的运动遭遇挫折的时候，发生了自下而上、堪称激烈的革命。革命和战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② 革命和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在是否采用常规化的现代化方案，以及采用何种具体方案的问题上，都伴随着“学习”与“反思”的交织。日本、俄国、英美、法德、新加坡、匈牙利乃至后来消失了的南斯拉夫，都曾经是中国人（至少是部分人）试图效法的对象，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外部世界学习，但是真正被效法而成就建制的，是苏俄和英美。不但战争和革命是在激烈的对抗和斗争中完成的，现代化方案的选择与再选择，通常总是政治选择和建制化活动，不会用纯粹和平的方式温和顺利地实现，而被处理为胜者全赢的斗争。正如 20 世纪中国许多学术讨论被冠之为某某“论战”，学术问题不但被“是/非”二分，而且常常被处理成分清“敌/友”的活动，所有这些都表示（如果不是因此之故的话）中国的社会信任严重不足，与此相应的是，现代性内在要求的论辩的合理性未能充分发育，它从根本上限制了政治文明的建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全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和国家能力都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悬殊的贫富分化现象，在社会主义中国以更为危险的情状现身。

三

“中国的现代性”概念的展开，蕴含着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理解；然而其最直接的要求，还是对“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的解释，即需要回答“何以有现在这样的中国”，在最简化的意义上是问“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连带涉及百年来的文化争论，就演变为“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性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争论。这说明，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必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包含了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视角，而最后一个问题，通常是中国哲学—思想史学者感兴趣的论域。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贤智之伦的议论却很少能够中其肯綮。简而言之，在外部世界惊呼“中国崛起”以前，流行于国内学术界的一种最直白的论断是“五四运动打断了传统，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长期止步不前”。转换成现代性批判的话语，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缺乏传统的维度，是本土文化要素缺位的现代性。这当然不能被视为恰当的判断，也与外部观察者的观察相冲突。从亨廷顿、艾森斯塔德到墨子刻，都强调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连续性。而身历其中的中国人更应该冷暖自知。我们应该直接提出的问题是，蕴含在“中国崛起”历史

^① 怀特海认为历史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西方历史中如蛮族和蒸汽那样，“都是驱动它们各自的文明脱离传统秩序的无情感的力量（senseless agencies）”，可以分别表现为“强制力”或者“暴力”。另一种是“经深思熟虑的理想的力量”，“属于重铸它们时代的那些说服的力量”，指现代民主和罗马时代的基督教。但是这两者在与中国文化相遇的时候，呈现为“西人以动力横绝天下”的形态。

^② 与此相应的是所谓“救亡 VS 启蒙”的争论。中国的特殊性也许正表现为寓启蒙于救亡之中，救亡唤醒了民族主义，后者是通向现代性的道路。但是通过救亡达到启蒙的路径，也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生成。

过程内部的“中国的现代性”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作用的是哪些传统要素，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由于它们的作用，中国现代性才得以既与西方现代性有所区别，又依然是现代性。这才是真正的韦伯式的问题。显而易见，我们离回答这个问题的距离还相当遥远。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进行中的“中国现代性”尚未被客观化，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需要借助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某些洞见。我们知道，韦伯是历史多元论者，在他看来，新教改革后的资本主义精神并非路德、加尔文辈设计所致。所以问题就转变为：在社会政治领域，人们的理想乃至政治措施可能引致的长期历史变迁，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控的？近代以来，自梁启超、孙中山之后，不少社会改革者都希望斟酌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可以造就一个既没有中国的陈腐、又没有西方弊病的新文化。但是，现代化史的研究专家发现：“有意识地把‘旧的最好的东西和新的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企图，无论其动机是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①不过，在对这些历史哲学问题保持追问的态度之中，我们依然可以在具体的问题上获得切实的进展，包括深入到研究现代人的心灵史，研究传统观念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过“创造性转化”，进入了现代意义世界；研究貌似“碎片化”的价值世界是如何构成的；研究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或者说如何促进了理性化的进程，更重要的，研究中国社会史如何新陈代谢。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概念，向人们提出了正确理解当代中国、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问题。

四

研究“中国传奇”的目标，从更长远、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也许指向了某种理想，描画某种愿景，至少是带有某种期望。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是高度反思性的活动，包含了自身是否可以改写、如何改写，“中国的现代性”可望如何改变“现代以后”的世界这样的问题。当代历史学家不乏如此的担忧：中国和西方在各自独立发展以后相遇，其“运会”有某种倒错，在20世纪，“中国要从衰势回头的时候，欧美却从盛况转向衰退……中国挟其蓄势待发的‘动能’，‘接过’欧美留下的制度和观念，然而问题在于，中国人接过来的是一个正在腐烂的‘现代文明’，我们怎么能盼望，已经衰败的种子能长出优良的成果”^②？这虽然不是一个严格论证的结果，却是中国人真实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传奇”似乎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墨菲斯特”的担忧，当里亚·格里菲尔德注意到中国人经过艰苦的学习，获得了西方文明的动力性、创造性和竞争力以后，情感复杂地对中国的读者说：“未来属于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友好地对待我们，而且比我们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③

我们需要解除各种各样的顾虑和对中国传奇的误解，不过更重要的是，中国回望自身，“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民族复兴尚处于进行时态。“中国传奇”的下半部，能否真正“过现代化的河”，进入一马平川，就要看我们能否既保持强劲的动力性，又能够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更合理的关系，建设社会团结和具有高度信任的平等主义的政治文化，而人们也能采取更合乎情理的生活观念。

[作者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62）。]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

② 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3页。

③ [美] 里亚·格里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前言第5页。

号与生活 / 交往方式的生产 - 再生产形式, 同时也取决于物质再生产的形式。

跳过更详细的具体分析, 本文的结论是, 如果允许我们扩大文明概念的内涵, 将生产方式、市场制度等一切物质力量也收入其中, 同时又保存文明之上层建筑意涵与物质力量的差别, 那么现代文明可以被理解为双重的或者说两层的。在其底层, 现代文明的物质动力层, 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为自己创造出经济形式; 在上层, 这种经济形式通过不同方式——社会与市场发生关系的方式、市场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方式——奠基了不同的符号与交往关系形式。现代文明之一元的普遍性, 存在于物质生产这个底层, 这是资本 - 市场 - 技术 - 劳动与经济交换的世界。而现代文明之多元的特殊性, 则存在于符号与交往关系再生产这个上层, 这是伦理、法律、政治以及公共舆论、审美、宗教的世界, 是传统和各种新兴力量的鏖战之地。

这是前互联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大致情况。中国崛起的时代也正是互联网社会经济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特征是物质、符号和社会交往三者界限之扬弃。移动互联网经济学的本质是赋予这种扬弃以持续的技术动力和经济形式。物质生产成为高度符号性的(最高端时尚的物质产品就是各种符号的使用、接受和发送器), 而符号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符号产物(作品、文本)从未像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和物质与货币结为一体。社会交往也随之高度符号 - 物质 - 抽象化了。在历史上,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于柏拉图的囚徒, 他们所面对的“事物”, 无非是符号和影像。^① 随着符号 / 影像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越来越步调一致, 现代文明的单一与普遍就会越来越压倒其多元与特殊。世界各地的文明城市面貌日益趋同, 市民和游客的面貌日益趋同, 昭示着世界历史不仅开始进入了科热夫所谓“普遍同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ous state), 而且开始进入了普遍同质的社会关系、空间结构和心理状态之中。在黑格尔哲学那里, 只有绝对才能真正终结历史。如果, 一个集精神(符号、社会与自身批判)和物质于一身的绝对总体有朝一日最终出现, 现代性文明无疑将成为世间唯一的文明。这意味着, 现代文明的真正历史就此开始, 而人类文明的历史将就此终结。

[作者丁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本专题讨论责任编辑: 盛丹艳)

① 参见 [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 514-515。

Multi-Modernity and Contemporary China(Symposium)

Gao Ruiquan & Yu Zhenhua & Ding Yun

Abstract: Gao Ruiquan holds that the concept of “multi-modernity” is a necessary premise for “China’s modernity”, which includ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most direct requirement is to understand the forming of “China’s modernity. The studies on “China’s modernity” must be a multi-disciplinary one. Yu Zhenhua discusses a cognitive dimension of modernity and believes that in the framework instrumental reason, explanation reason and argument reason, ther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a’s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s there is a balanced view between oneness and diversity, and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Ding Yun points out tha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could be understood as of being two-strata, and its lower stratum is for universalit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its upper stratum is for particularity of the re-production of sign and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time of Internet, the one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will increasingly overwhelm multiplicity and particularity.

Key word: modernity, universality, particularity